

中華文史論丛

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文史論丛

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总第四十五期)

上海古籍出版社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Second Series 1989

中华文史论丛

一九八九年第二期

(总第四十五期)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 上海发行所发行 昆山兵希印刷厂印刷

1989 年 9 月第 1 版 198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065 定价：3.00 元

目 次

- 元好问在汴京(《元好问传》的一章) 朱东润 (1)
- 张栻子嗣考疑 何冠彪 (21)
- 西周公卿职位考 杨善群 (41)
- 试论北魏前期分部制的演变 严耀中 (55)
- 唐代阶官与职事官的阶官化论述 张国刚 (71)
- 唐代散官初论 黄正建 (91)
- 蛮书碑录 施蛰存 (103)
- 王国维与《水经注》 陈桥驿 (113)
- 论《韩非子·难篇》的性质及写作年代
..... [马来西亚]郑良树 (131)
- 《诗经》新译一束 方 平 (153)
- 《河岳英灵集》音律说管窥 李珍华 傅璇琮 (171)
- 从时与地看草窗词 陈邦炎 (191)
- 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

- 之观照中的反思 [加拿大]叶嘉莹 (209)
我国古代小说批评的范畴体系及理论
 贡献 孙 遂 孙菊园 (253)
论清代文学批评的时代特征及其理论意义 王镇远 (283)
清代前期关于女性应否有“才”之讨论 刘咏聪 (315)
- 论明代宦官与明代文化 王春瑜 (345)
西门庆官职考 陈 谷 (363)

《中华文史论丛》1987—1989年分类目录索引

- 赵彦伯诗及其人辨疑 赵昌平 (130)
皎然诗谒韦应物辨误 赵昌平 (170)
王祜不名“祐”辨 祝尚书 (208)
宋懋澄生卒年考 郑平昆 (252)
饭含小考 吕 静 (344)

CONTENTS

Yuan Haowen in Bianjing.....	Zhu Dongrun (1)
Open Questions Concerning Zhang Shi's Male Offspring	He Guanbiao (21)
A Research on the Posts of High Officials in the	
Western Zhou Dynasty	Yang Shanqun (41)
Tentative Views on the Evolution of the Ministry	
Division System in the Early Northern Wei Dynasty	Yan Yaozhong (55)
On Tang Dynasty's Officials Bearing Only Rank Titles	
(<i>Jieguan</i>) and the Adoption of Such Grading in the	
Case of Officials Charged with Actual Duties (<i>Zhishi</i>	
<i>Guan</i>).....	Zhang Guogang (71)
A Trial Commentary on Tang Dynasty's <i>Sanguan</i>	
(Officials Bearing Ranks Without Duties)	
.....	Huang Zheng jian (91)
Tablet Records of <i>Manshu</i> (Annals of Yunnan)	
.....	Shi zhecun (103)
Wang Guowei and <i>Shui Jing Zhu</i> (Book of Waterways	
with Annotations).....	Chen Qiaoyi (113)
On the Nature and the Date of Authorship of <i>Han</i>	
<i>Fei Zi-Nan Pian</i>	Zheng Liangshu (131)

- New Annotations to *Shi Jing* (Book of Songs)
..... Fang Ping (153)
- A Glimpse of the Doctrine of Temperament as
Advocated in *Heyue Yingling Ji* (A Collection of
Essays on Poets and Poetry)
..... Li Zhenhua Fu Xuancong (171)
- Viewing *Cao Chuang Ci* (Zhou Mi's Ci) in Terms of
Time and Place Chen Bangyan (191)
- Retrospection on the Traditional *Ci* Poetry Studies
and Wang Guowei's *Ci* Poetry Discourse in the
Light of the Western Theories..... Yeh Chia-Ying (209)
- The Category System and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Making Criticism on the Chinese Fiction in Ancient
Times..... Sun Xun Sun Juyuan (253)
-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and Theoretical
Meanings as Shown by the Literary Criticism
in the Qing Dynasty Wang Zhenyuan (283)
- Early Qing Dynasty's Discussions on Whether Women
Should Possess "Ability and Talent"..... Liu Yongcong (315)
- Eunuchs vs. Culture in the Ming Dynasty
..... Wang Chunyu (345)
- A Research on ximen Qing's Official Positions
..... Chen Zhao (363)
- Classified Index to the Contents of the 1987-1989
*COLLECTIONS OF ESSAYS O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元好问在汴京*

朱东润 遗稿

金哀宗正大八年遗山进入汴京。次年正月改元开兴，四月再改为天兴。

金史本传：“天兴初，擢尚书省掾；顷之，改左司都事，转行中省左司员外郎。”

从一般情况讲，从外州知县擢为尚书省掾，不久进为尚书省左司员外郎，这是一种特有的擢升，而在这次擢升中礼部尚书赵秉文曾经为他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过时代不一样，在这个兵荒马乱中，调升要地，焉知非祸。不过当时的元遗山，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早一年他的夫人张氏病歿。开兴三月朔，死于汴州。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书省令史元好问第三女也。兴定乙卯，生于登封。年十三，予为南阳令，其母张病歿，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声人不忍闻。明年得疾于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为言：“亲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为弃父矣。”曰：“女从母为顺，宁从母死耳。”竟以开兴壬辰三月朔死。

这里看到遗山入京以后，死丧之灾，接踵而来，但是不久而后，国家的厄运，也相继而至了。

这一年正月蒙古兵破唐州。金元帅娄室在襄城、汝坟和蒙古兵接战，娄室退至汴京，这是说金人的最后一道防线，已经到了京城的周围了。本来的元帅古里甲石伦已经退休了，重行起用。军队从各个方面调到汴京附近，甚至连军士的家属也调来，这一来~~~~~

* 本文是朱东润先生生前所著《元好问传》的第五章。全书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就是五十万人，增加了守御的力量。其余正在调遣中的还不计其数。蒙古兵也集中在郑州，前锋直薄汴京。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汴京的争夺战。金人已经把可以调动的军队都集中在汴京的四围。蒙古兵也集中兵力准备结束这一仗。

在这次战争中，陈和尚的英雄气概特别出了名。陈和尚仿佛姓陈，以僧侣为业，其实完全不是这回事。他姓完颜，是金皇朝的一家，他的部下是一大群无赖，回纥、乃蛮、羌、浑以及中原被俘的逃犯，无所不有，可是在陈和尚的带领下，每个人都成为战争中的英雄。三峰山一战，陈和尚走钧州。蒙古兵破钧州，遍索陈和尚不得。两日后自出，问其姓名？他说：“我就是忠孝军的总领陈和尚，战胜大昌原的是我，战胜卫州的也是我，战胜倒回谷的还是我。我死在乱军中，人必谓我有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兵的大将看到陈和尚必然不肯投降，请他喝过马奶，他一边令人开刀，一边说：“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今我得之。”三峰山一败以后，金兵不可复振，但是汴州仍在坚守中，蒙古兵就在汴州的周围作战。

皇帝实在不是容易做的。遇到国势昌盛，大家客客气气地称你一声好皇帝；可是遇到困难的时代，那时大家就会指你骂“昏君”、“杀坯”。其实皇帝也真可怜，他只是同我们一样，五官七窍、饮食、男女、拉溺，没有什么特别的功能，为什么要他负这么多的责任。当然，你也可说：那么他为什么要当皇帝呢？其实他是不得已，是不由自己作主的。

哀宗的情况，当然不同于明思宗，但是他也是不同于陈后主或是南唐后主的人物，这是无可置疑的。在汴京被围的当中，为什么他决定要出京？汴京是一个富庶的地方，即使在这个战争频繁，蒙古的军队几乎把汴京包围起来的时代，究竟还是有隙可乘，自己带了大兵出城，蒙古兵是来不及一呼尽至，把他包围，那么出汴究竟是可能的。只要自己有足够的勇气，突围是必然可以成功的。但是

哀宗的目标，绝对不可能只是突围。在他原定的计划里，是留着皇太后、皇后在京，假如只是突围，那岂不是把两宫白白地交给蒙古，作为人质，为自己日后的屈服留下一条后路，这是战争中的真正领导者所不屑的。至若所传请以一车两马载国史文籍自随之说，可能只是当时有这样的传说，其后哀宗自焚于幽兰轩，金之史料，遂不复全，因有此说。其实在哀宗出京的时候，即使在屡经挫败之余，必然还认为蒙古是一个组织尚未完备的部族，在作战中即使有偶然获胜的可能，但是较之于金，未必有决胜的把握。

历史不是没有偶然性的。但是在许多偶然性的巧合碰在一起，那就成为必然性了。哀宗的渡河作战，是他的决心和当时的处境一经结合必然发生的结果，渡河作战、终归失败，汴京城中的一个小小的西面元帅崔立，乘机作乱，遂使遗山蒙不世的污名，这是无论如何洗刷不清的。假如这时他还在邓州，情况当然不同了。

哀宗的决定亲征，是一件非常坚决而又勇敢的策略。在估计到当时女真和蒙古的情状，也不失为是经过仔细衡量的决定。两方面都是新起的民族，都有一种敢于进取的勇气。所不同的是蒙古族还没有掌握过政权，因此也很少受到腐蚀的机会，在这方面是比较坚强的；女真族已经掌握了政权一百多年，因此不免受到暮气的腐蚀。

金末的太学生刘祁在他的《归潜志》里也有类似的记载：

南渡（指宣宗徙都开封事）之后，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当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每相与议时事，至其危处，辄罢散曰：“俟再议。”已而复然。因循苟且，以致亡国。

南渡之后，朝廷近侍以谄谀成风，每有四方灾异或民间疾苦将奏之，必相谓曰：“恐圣上心困。”当时有人曰：“今日恐心困，后日大心困矣。”竟不复言。又在位者临事，往往不肯分别可否，相习低言缓语，互推让，号“养相体”。吁，相体果安在哉！又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

者，曰：“恐生事。”故正人君子多不得用，虽用亦未久，进退间，宰执如张左丞行信、台谏官如陈司谏规、许司谏古、雷御史，皆不能终其人也。

南渡之后，近侍之权尤重。盖宣宗喜用其人耳目以伺察百官，故使其奉御輩采访民间，号“行路御史”。或得一二事即入奏之。上因切责台官漏泄，皆抵罪。又，方面之柄虽委将帅，又差一奉御在军中，号“监战”，每临机应变，多为所牵制，辄遇敌先奔，故其军多丧败。

哀宗决定亲征，大政方略既定，这就决定以奴申参知政事兼枢密副使，完颜习捏阿不枢密副使兼开封府，权参知政事留守京师。奴申和阿不两位是驻守京师的主要人物。以把撒合为外城东面元帅，朮甲咬住南面元帅，崔立西面元帅，李朮鲁买奴北面元帅。一个开封城，负责守城的是四位，都是元帅。当时的布置确实是没有经过熟虑的。哀宗既然决定亲征了，一时却没有决定亲征的主要方向，这实在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件。哀宗认为蒙古的重兵在西，破凤翔府在西、破潼关的也在西，因此主攻方向，必然在西。这里看到哀宗确实是一位决心求战的领导，但是他却没有考虑到西向求战的艰苦。幸亏巩昌元帅完颜忽斜虎从河南府来，他指出从开封往河南府，三百里之内，人民都逃完了，没有灶、也没有井，即使有井也填塞了，大兵一动，凭什么可以生活下去。这时事实胜于雄辩，哀宗决定放弃西行的计划，但是他的求战心切，这是不能动摇的，他立刻决定把方向改成向北，好在那里都有蒙古的武士，要打仗是不愁找不到对手的。

天兴元年十二月初一哀宗出京，留守官和京城父老至城外奉辞，哀宗和留守奴申谈到东面元帅李辛口出怨言，罢为兵部侍郎，在哀宗出远以后，奴申召李辛，李辛一想，情况可能已经泄露了，下了决心向蒙古兵乞降，弃马出城，这里奴申立刻派人把他捕获，当即杀了。汴京城里的百官人民日夜盼望哀宗能把蒙古打退，蒙古没有打退，汴京的物价却在飞涨，后来传到的消息，是哀宗已经渡过黄河径造归德去了。宋代以来，当时有四京：北京大名府、东京

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南京归德府。归德虽然也是京城，究竟和开封不同，相去太远了。奴申还记得哀宗在京中时，曾经发过一次雷霆，对着自己大骂：“近日纪纲安在？”奴申只有战战兢兢的回报一声。待到回衙以后，他厉声地对下属说：“上面追问纪纲安在，你们哪一个曾经把纪纲带给我看一下？”

哀宗确实是一个值得同情的皇帝，但是在他的左右却聚集了这一大批大臣和元帅。蒙古的军队正在从多方面包围过来，自己却封锁在归德城内，他没有可靠的后方，没有得力的大将和重臣。归德和汴京相去并不远，汴京已经到了斗米二十两白银的境地，缙绅士女行乞于市，有的甚至于自食妻子。一切用皮革做成的家具，早已煮食殆尽。王侯第宅，故家乔木，也已开伐无余，无用置议了。

东面元帅李辛因为想要投降被杀了，西面元帅崔立却能干得多。他的计划是立梁王监国，对蒙古投降，自称左丞相、都元帅、尚书令、郑王。计划定了以后，群小附和，请为立建功德碑。翟奕以尚书省命召王若虚为文。若虚自分必死，私谓左右司员外郎元好问：“今召我作碑，不从则死，作之则名节扫地，不若死之为愈。不过，首先和他们谈一下。”他和翟奕说：“丞相功德碑当指何事而言？”翟奕大怒地说：“这还要问？丞相以京城降，活生灵百万，这不是功德是什么？”若虚道：“学士的责任是代君主立言。这样的功德碑，是代君主立言的体裁吗？还有一层，丞相既以汴京投降，满朝官吏都是丞相的部下，自古岂有部下替主子歌功颂德而为人所信者吗？”若虚的议论，侃侃而谈，翟奕一时竟说不上来。

但是功德碑还是要立的。崔立只是汴京一个泼皮，可是对于立碑的事却非常热切，他认为拥立梁王监国，向蒙古人投降，免去一城的屠杀，是一件非常的功德，因此要立碑，为自己树立一个千古的纪念，可是问题在于由什么人撰作呢？当然应该由王若虚撰述，他是学士，是当时最有名的文人。可是王若虚爱惜自己的声名，不肯为汉奸树碑立传，那么由谁来撰述呢？当时的才子还有超

过好问的吗？好问也不是不能为汉奸立传的，但是他还下不了决心，这就想起当时的最高学府太学的高材生刘祁。刘祁推卸不得，可是他也以为汉奸树碑为耻，不过还是作了。好问见猎技痒，他曾经作过不少的辩诉，但是却无从洗刷他曾作过大量修改的事实。

刘祁对于这件事实，在他的《归潜志》里是和盘托出的：

崔立既变、以南京（实指汴京，和当时的北京对比，则称南京）降，自负其有救一城生灵功，谓左司员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时立一石书吾反状邪？”时立国柄入手，生杀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诸在位者畏之，于是有立碑颂功德议。

数日，忽一省卒诣予家，赍尚书礼房小帖子云：“首领官招赴礼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预事，不知何谓，即往至省门外，遇麻信之。予因语之，信之曰：“昨日见左司郎中张信之，言郑王碑事欲属我辈作，岂其然耶？”即同入省礼房。省掾曹益甫引见首领官张信之、元裕之二人，曰：“今郑王以一身救百万生灵，其功德诚可嘉。今在京官吏父老欲为立碑纪其事，众议属之二君，吾已白郑王矣。二君其无让。”予即辞曰：“祁辈布衣无职，此非所当为。况有翰林诸公如王丈从之及裕之輩在，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众心，且吾曹生自王得之，为之何辞？君等无让。”予即曰：“吾当见王丈论之。”裕之曰：“王论亦如此矣。”予即揖出，至学士院，见王丈，时修撰张子忠、应奉张元美亦在焉。予因语其事，且曰：“此实诸公职，某輩何与焉？”王曰：“此事议久矣，盖以院中人为之，若尚书檄学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老心，若自布衣中为之，乃众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今士民属子，子为之，亦不伤于义也。”余于是阴悟诸公自以仕金显达，欲避其名，以嫁诸布衣。又念平生为文，今而遇此患难，以是知扬子云剧秦美新，其亦出于不得已耶？因逊让而别。

连延数日，又被督促，知不能辞，即略为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后，一省卒来召，云：“诸宰执招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骑马素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省中召王学士诸公会饮。余亦阴揣其然。既入，即引诣左参政幕中，见参政刘公谦甫，举杯属吾二人曰：“大王碑事，众议颂公等，公等成之甚善。”余与信之俱逊让曰：“不敢。”已而谦甫出，见王丈在焉，相与酬酢，酒数行，日将入，余二人

告归，裕之曰：“省门已锁。今夕既饮，当留宿省中。”余等无如之何。已而烛至，饮余，裕之唱曰：“作郑王碑文，今可毕手也。”余曰：“有诸公在，诸公为之。”王丈谓余曰：“此事郑王已知众人请太学中名士作，子如坚拒，使王知学士輩不肯作，是不许其以城降也，则衔之以刻骨，缙绅俱受祸矣。是子以一人累众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触其锋，祸及亲族，何以为智？子熟思之。”予惟以非职辞，久之，且曰：“予既为草定，不当诸公意，请改命他人。”诸公不许，促迫甚。予知其无可奈何，则曰：“吾素不知馆阁体，今夕诸公共议之。如诸公避其名，但书某名在诸公后。”于是裕之引纸落笔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之作，以为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载亦可也。”余曰：“裕之作正宜，某复何言。”碑文既成，以示王丈及余，信之欲相商评，王丈为定数字，其铭辞则王丈、裕之、信之及存余旧数言，其碑序全裕之笔也。然其文止实叙事，亦无褒称立言。时夜几四鼓，裕之趣曹益甫书之，裕之即于烛前焚其稿。迟明，余辈趋出。

这是刘祁《归潜志》的记载，他指出这篇碑文主要是遗山作出的，自己，甚至王若虚都曾经共同商定，麻信之也参与其事。

但是，遗山的《外家别业上梁文》的记载却不是这样。

穷于途者返于家，乃人情之必至，劳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属风霜匱薄之余而有里社浮湛之渐，兹焉卜筑，今也落成。遗山道人蟫蠹书痴，鸡虫禄薄，猥以勃窣婆珊之迹，仕于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迁，东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于春夏之长围，穷甚析骸，死唯束手。人望荆兄之通好，义均纪季之附庸，出涕而易于吴，莫追于既往，下车而封之杞，有覩于方来，谋则金同，议当孰抗。爰自上书宰相，所谓试微躯于万仞不测之渊；至于喋血京师，亦常保百族于群盗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实闻存赵之谋；枯木死灰，无复哭秦之泪。初，一军构乱，群小归功，劫太学之名流，文郑人之逆节，命由威制，佞岂愿为？就磨甘露御书之碑，细刻锦溪书叟之笔。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修；赵王禅文，何预陆机之手迹。伊谁受赏，于我嫁名，悼同声同气之间，有无罪无辜之谤，耿孤怀之自信，听众口之合攻，果吮痈舐痔之自甘，虽窜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证龟而作鳖，始于养虺以成蛇。追韩之骑甫还，射羿之弓随彀，

(予北渡之初，献书中令君，请以一寺观所费，养天下名士，造谤者二三，亦书中枚举之类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凭。复齿平民，但延残喘。泽畔而湘累已老，楼中而楚望奚穷。悼先人之敝庐，可怜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岂谓事有幸成，计充私便，东诸侯助竹木之养，王录事寄草堂之资，占松声之一丘，(东皋子《北山赋》：菊花两峰，松声一丘。)近桃花之三洞，(予此别业，与白子西所居相近。)东墙西壁无补折之劳，上两旁风有闭藏之固，已与编户细民而杂处，敢用失侯故将而自名，因之挫锐以解纷，且以安常而处顺。老盆浊酒，便当接田夫之欢；春韭秋菘，尚愧夺园夫之利。彼扶摇直上，击水三千，韦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庙堂佐天子，盖有命焉，使乡里称善人，斯亦足矣。辄取合欢之意，演为助役之谣。

从刘祁和遗山两篇作品相比，他们之间是有相当的距离。但是刘祁并不讳言自己也参与其事；遗山则极力洗刷，正因遗山急于洗刷，愈觉刘祁的可信。从另一方面言之，遗山有《东平行台严公神道碑》、《东平行台严公祠堂碑》、《顺天万户张公第二碑》；能为严实、张柔作碑，当然也不难于为崔立作碑，因为从大义讲，三人的为蒙古前驱，其实是什么也没有什么差别的。按照当时蒙古军的规律，在围城时，城中敢于抵抗者，城破之后，不论老幼，一概处死。遗山之兄敏之即以此被杀。因此遗山亦不难于为崔立作碑，所以在刘祁、遗山的不同记载中，刘祁的话是比较可信的。

这一年是 1232 年，距现在 750 年了。无论是女真，是蒙古，甚至是汉人，大家都很幼稚，很少有，甚至竟没有接触到现代的文明，因此在战争，在敌对，甚至在人与人的接触方面，是很难用现代文明的认识来衡量的。在叙述到当时的历史现实的时候，我们很难为当时的现实讳饰，甚至也不应当讳饰，因为有了过去才有现在，现在是由过去一步一步地发展而来的，而且还必然一步一步地向前迈进，共同创造更加文明美好的将来。

叙述汴京失陷以前的情况，遗山有《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旁僵卧满累囚，过去旗车似水流，红粉哭随回纥马，为谁一步一回

头。

随营木佛贱于柴，大乐编钟满市排，虏掠几何君莫问，大船浑载汴京来。

白骨纵横似乱麻，几年桑梓变龙沙，只知河朔生灵尽，破屋疏烟却数家。

此外，尚有《续小娘歌十首》。既曰“续”，则当另有《小娘歌》，但是已经失传了。

吴儿沿路唱歌行，十五五和歌声，唱得小娘相见曲，不解离乡去国情。

北来游骑日纷纷，断岸长堤是阵云，万落千村借不得，城池留着护官兵。

山无洞穴水无船，单骑驱人动数千，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何处过明年。

青山高处望南州，漫漫江水绕城流，愿得一身随水去，直到海底不回头。

风沙昨日又今朝，踏碎鵝头路更遥，不似南桥骑马日，生红七尺系郎腰。

雁雁相送过河来，人歌人哭雁声哀，雁到秋来却南去，南人北渡几时回？

竹溪梅坞静无尘，二月江南烟雨春，伤心此日河平路，千里荆榛不见人。

太平婚嫁又离乡，楚楚儿郎小小娘，三百年间培养出，却将沙漠换牛羊。

饥乌坐守草间人，青布犹存旧领巾，六月南风一万里，若为白骨便成尘。

黄河千里扼兵冲，虞虢分明在眼中，为报淮西诸将道，不须夸说蔡州巩。

这后面十首歌是蔡州陷落以前的诗呢，还是陷落以后的诗？从我的认识看，是蔡州陷落以前的诗。哀宗在开封陷落以后，摆脱归德左右的蒙古侵略者，移驻蔡州，这是事实，后来他在蔡州自杀，金

亡，这也是事实。但是作为一个诗人，一再劝导宋人，指出虞、虢分明的故实，那就未免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浪费，因为如若蔡州已经陷落，劝导完全是不必要的。我的估计是汴京陷落以后，哀宗自归德南行，驻军蔡州，蒙古和宋人正在联系，因此遗山有此一诗，不过这首诗蒙古人不感兴趣，宋人又急于复仇，甚至还在计划在亡金的遗址上，画出一幅保卫自己的蓝图，对于这首诗也不是听得进的。

在《癸巳北渡三首》中，我们感到震动的是汴京陷没以后，蒙古人对于金人的处理，完全和北宋没落时金人对于宋人的处理一样，几乎是一幅破京大掠图的复印本。随营大佛、大乐编钟，对于阿骨打、吴乞买这些人是不感兴趣的。这正和对于木华犁一样。从《续小娘歌》里却看到一个新的发展。当时的蒙古已经打过中亚细亚，而中亚细亚的商贩，包括人贩子在内，却大量地涌向东方，“三百年来涵养出，即将沙漠换牛羊。”这一种人的买卖，蔡州下的时候固有，汴州下的时候也同样有；甚至因为人口兴旺，买卖的市场来得更兴旺发达。痛苦的是这些兑换牛羊的“楚楚儿郎细细娘”之中，绝大多数不是女真人而是那第三阶级的接受女真统治的汉人，“三百年”是从开宝之初 960 年计算，直至 1234 年汴州城破为止，共 275 年，举大数计则为 300 年；倘若从靖康元年 1126 年，金人入汴计算，是无论如何不能满 300 年的。这就给我们上了一课，亡国奴是世袭的，不但自己宁死不能当，即为子孙后代计，也是宁可绝子绝孙也是不能当的。这里我们为遗山惋惜的，是他理解到这一点，却忘去自从 916 年石敬瑭割燕云十六州之日起，沙漠换牛羊的厄运久已笼罩在北中国人民的头上，每一个统治者都有不可推却或卸灭的责任，更不能单独责成这个二道贩子的金哀宗。

哀宗出汴时的策略是说不清楚的，最初他是想沿河西上，可能还有恢复西京和潼关的幻想。及至完颜忽斜虎告以京西三百里之内没有居民，没有房屋，没有井灶，这就改定方向，决心北向求战，这种临阵决策盲目求战的方法，实在是兵家的大忌。既然不能向